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与实践研究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LILUN YU SHIJIAN YANJIU

主编 王国敏



四川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与实践研究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LILUN YU SHIJIAN YANJIU

顾 问 杨泉明 李志强 何云庵

主 编 王国敏

副主编 邓淑华 李 杰 吴敏英 余仕麟

曾 狄 黄金辉 郑 晔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国敏 邓淑华 李 杰 刘从政

刘益飞 吴敏英 余仕麟 张星炜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滨蓉
责任校对:张战清
封面设计:翼虎书装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 王国敏主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614-4181-7

I. 马… II. 王… III. 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4580 号

书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主 编	王国敏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181-7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85 mm × 260 mm
印 张	20
字 数	467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 经验的哲学思考（代序）

◆杨瑞森^①

近几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研究，引起学界广泛重视，并相继出版了许多很有分量的科研论著，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它涉及理论、历史和现实等诸多领域，遍布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甚至可以说，它涵盖了党的全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因此，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就需要选择适当的视角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容易引起歧义的研究课题，目前我国学界对这一课题中许多问题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这就需要加强科学研究，通过学术交流和争鸣达成共识。鉴于上述考虑，我拟从哲学角度就本课题谈几点粗浅看法。具体说来，拟着重阐明下列几个基本观点：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应理解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研究解决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因此，谈论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首要前提，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普遍性。其二，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根本问题和核心内容，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因此，研究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应该紧紧围绕着这一根本问题来展开，从对这一根本问题和核心内容的回答和解决中求得结论。其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应着力论述和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与此同时，还应阐明和揭示两大理论成果间、特别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其四，创造性地学哲学、用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显著特点和优良传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大力倡导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对提高干部素质和增强贯彻执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有重要意义。因论文内容涉及范围较广，兼之时间匆促，缺少深入研究，因此，文中错谬之处定当不少，恳请学界同仁惠予批评指正。

^① 杨瑞森，教育部社科司原司长。《求是》2004年第1期，第2页；《求是》2005年第1期，第2页；《求是》2006年第1期，第2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一、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重要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同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和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责任联结在一起的。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就不能停留在理论的或思想文化的层面。在我看来，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历史经验的研究引向深入，下列一些问题是首先需要着力研究的。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即科学内涵的理解和界定问题：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其中“化”的涵义是什么？怎么个“化”法，“化”成什么？其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问题：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是什么？中国作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为什么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在西方土壤上产生的社会政治学说，何以能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其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问题：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是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自产生时起距今已有 150 多年，中国和世界的形势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那么，为什么还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呢？这几个理论问题的核心内容，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普遍性问题。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普遍性，乃是谈论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有问题的首要前提。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涵义的理解

我国一些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涵义的理解上，常常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混同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涵义的理解仅仅局限在思想理论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将产生于西方土壤上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具有中国民族特性和风格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第一个明确提出、使用和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概念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在 1938 年 10 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曾深刻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①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中，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表述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他还讲过，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带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涵义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具

^① 晋察冀日报社编：《毛泽东选集》第 5 卷，1944 年 5 月初版，第 20～21 页。

体化,化为具有中国民族特点或特性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实践化,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去研究、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涵义中,这后一方面,即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中国化为实践、变为现实,更具本质意义,因为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固然十分重要,然而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创立毕竟是为改造中国的客观现实服务的。

这里,在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涵义即科学内涵问题时,需要顺便简略地谈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直接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内涵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它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因此,上面我们谈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两个基本方面,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表现形式,又会有某些特殊性。2003年,我在一篇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而撰写的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简略地概括为“五化”,即哲学化、方法化、理论化、群众化和实践化。这里所说的“哲学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在深入研究和总结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所说的“方法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里所说的“理论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里所说的“群众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武器;这里所说的“实践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一种纯粹精神领域中的思辨活动,也不仅仅是从一种哲学形态向另一种哲学形态的飞跃或转变,而是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化,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斗争实践,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①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意义,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走向,都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根源和历史根据,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普遍性。

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东方文明大国,为什么不用自己的传统文化来解决

^① 参见《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年第11期。

近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反而需要用在西方土壤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来“化”呢？这就涉及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科学性和历史作用的分析 and 估量问题。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文化的国家。中华民族以其丰富而深刻的文化著称于世，为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和世界思想文化宝库中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但是，应该指出，在认识和把握历史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当把文化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一定的历史环境中，用历史去阐述文化，而不是相反，把历史归结为文化，用文化史观去说明历史。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它毕竟是一定社会经济与政治在观念上的表现或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尽管它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内容，但它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其历史作用也是有限的。包括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中华文明历史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和财富，但从总体上说，中国传统哲学尚不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大家知道，就中国传统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而言，由于古代中国农业社会生产规模的狭小和较低科学水平的限制，中国传统哲学还不可能科学地揭示整个世界的普遍联系，不可能对认识事物的运动变化及其发展规律提供充分的客观依据。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观上，由于受着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许多观念和主张必然要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统治，不可能成为一种普世哲学，不可能成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引导人们科学认识和解决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为中华民族振兴指明出路。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也有一些先贤哲人试图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来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的社会问题，但是，都失败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这里，我觉得应当把思想文化的渊源和传承同指导理论的来源和根据区分开来。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广泛传入中国，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并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科学，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和历史发展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广泛传入中国并被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是同近代中国面临的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救国救民真理的不懈探索联系在一起的，归根结底是近代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众所周知，中国自鸦片战争后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祖国濒临危亡境地。于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遂成为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振兴，不但进行了长期的可歌可泣和波澜壮阔的英勇革命斗争，而且还进行了关于救国救民真理和革命发展道路的艰难探索。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近代中国的一些先贤们首先接触到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他们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已步入帝国主义之后的一个时期内，在马克思主义不但在欧洲产生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之时，仍在执著地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他们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的亲身体验，通过反复的比较和深入学习与思考，才接

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的。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选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選擇，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历史任务的需要。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能够解决近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科学真理来接受的，他们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后来的历史也令人信服地证实，近代先进的中国人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之后，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思想面貌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就结束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我们可爱的祖国就走上了一个独立的和健康发展的民族振兴之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来接受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务必不要忘记这一历史起点和理论前提。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斗争实践，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阶段计八十多年的奋斗历程，并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事业所取得的重大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是世人所公认的。但是，对这些成绩取得的根本原因和根本性质，在认识上则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比如，有些人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说成是放弃马克思主义、搞“民主社会主义”的结果；有人把我们党提出的诸如“以人为本”的指导方针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等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说成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悖的抽象人道主义或西方人本主义的东西；有人甚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等。这些观点是需要加以澄清的。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年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我们党在总结新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论断和新观点，形成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崭新的理论成果。正是在这些新思想、新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些新思想、新论断和新观点，都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应用、体现、具体化、深化和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创立，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理论的形态或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例如，在邓小平理论中，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点，诸如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范畴的提出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科学揭示，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思想的历史性突破，以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从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走向共同富裕、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模式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战略构想等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又如，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江泽民同志所强调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生产力、文化和人民群众三条最为重要的基本原理，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要和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趋势，揭示其重大的当代特殊价值，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江泽民同志所反复强调的要坚持“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这本身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所独具的理论品质和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的和本质的要求。再如，关于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明确地将科学发展观界定为“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由此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致的。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胜利的历史；我们党正是由于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那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和阉割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内容和本质的观点，那种否定党的历史和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的观点，那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混同于民主社会主义和西方人本主义的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普遍性的理解

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中叶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距今已有150多年。同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相比较，当今世界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中国的历史与国情也与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那么，为什么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呢？这就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普遍性的认识问题。这也正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回答和解决的一个首要的前提性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

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必须始终坚持，并不是因为它是某种神圣的教条，因而必须始终遵从，也不是因为它是某种离开实际的抽象的哲学原则，可以任意推广，去裁剪现实，而是因为它是从客观世界的历史发展中总结出来的关于事物发展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客观事物本身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必然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所揭示的是事物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例如，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提出的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原理，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原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高社会理想的原理，以及在哲学上提出的关于认识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关于矛盾分析和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主人的原理等，都具有真理的普遍性、适用性和相对稳定性。当然，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领导本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斗争实践中，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所承担的具体的社会历史任务无疑是各不相同的和纷繁复杂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提供

现成的答案,指明具体的发展道路和应采取的具体的策略原则,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斗争实践中所遇到的特殊困难和问题,应由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自己去独立地进行探索 and 解决。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在斗争实践中所遇到的矛盾特殊性中,又蕴含着矛盾的共性即普遍性。比如,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时代相比较,尽管在经济、政治等领域中的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中呈现出许多新情况和新特点,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社会基本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因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就不存在什么“过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现改造世界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只有科学地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才有助于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只有借助于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才能在国际国内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把握斗争方向,实现奋斗目标。所以,我们在谈论和强调事物矛盾的特殊性问题时,务必不要忘记矛盾特殊性与矛盾普遍性的相互联结,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客观性和普遍适用性,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认识和解决当今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重要指导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根本问题和核心内容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应同认识和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这一根本问题和核心内容结合起来。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和核心内容的经验。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根本问题和核心内容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根本问题,是研究和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与此相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则是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是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和核心内容。我们党领导和推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围绕着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这一根本问题和核心内容展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思想理论倾向问题,都是在认识和解决主客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这一关系问题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几大理论成果的认识论本质,是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也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分析、认识和解决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矛盾或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所以,研究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必须同研究和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结合起来,同研究和分析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斗争实践问题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要在全面研究和分析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问题和核心内容的基础上,去研究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这样的国家,如何走上一条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之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一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这样，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深入研究和分析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社会矛盾，去不断探索和总结近代中国社会发 展规律和革命与建设规律，去寻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出路和方法。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极具理论创新精神的党。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我们党总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站在时代的最前沿，着眼于中国的历史特点和发展，在实践探索中研究新情况，提出新观念，找出新途径，形成新理论，解决新问题，从而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乃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历史；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经验。

（二）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应该说，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即已开启。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当时我们党尚处在幼年时期，所以，在建党之后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党对于诸如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中国武装革命的具体道路、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等这样一些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认识上并没有科学的回答和解决，因而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就难以避免遭受严重挫折或失败。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同志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杰出的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毛泽东笃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特别重视对外国经验的学习，但他从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和外国的经验，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潜心于中国社会状况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因此，他能够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出新观念，创造新理论，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提出的种种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他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正确地定位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杰出理论篇章。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土地革命时期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论著，标志着我们党已探索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为特征的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论政策》、《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论著，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我们党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中依靠谁、团结谁和反对谁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原则问题。毛泽东同志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及其他一些论著，对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作了哲学总结，对割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左”倾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作了哲学分析和批判，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作了哲学论证。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党领导的我国民主革命中遇到的几个最为尖锐和紧迫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而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现了我国民主革命的全面胜利。

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已由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转变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新时期。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新的历史课题。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大胆突破苏联的建设经验和发展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很多重要成绩。特别是在我国三大改造刚刚完成、我国社会发展处在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提出并系统阐发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以及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中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思想,具有普遍的和深远的指导意义,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当然,由于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也还是初步的,其中有些重要的思想理论成果在实践中亦并未得到很好贯彻,有些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思想理论观点,则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因而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这一历史事实深刻表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正确思想路线的制定、确立和贯彻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作为实际工作中的根本矛盾和核心内容,是始终存在的,须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加以认识 and 解决。

(三) 坚持解放思想,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里程碑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大门,经过三十年的大胆探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与时俱进,大力倡导和强调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要大力倡导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当今条件下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有新的特点,不解放思想和创新理论就不可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人们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等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着某些僵化和曲解的错误倾向或问题。这样,强调解放思想和实现理论创新就成为关系我们党、国家、民族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指出的那样:“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的几届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了我们党独具的富于理论创新精神的优良传统和品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深入研究当今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和新表现,以及当今国际形势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科学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样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使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形成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在实践上取得了我国经济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会持续快速发展的骄人成绩，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向纵深发展。

(四) 坚持解放思想与坚持实事求是的内在统一性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党所强调的解放思想，并不是随心所欲、胡思乱想，而是必须有所遵循，是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原则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就是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他还强调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与此相关，我们所强调的理论创新，也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或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创造性应用、深化、展开、丰富和发展，而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或用什么其他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在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的同时，又十分强调要始终牢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①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更精辟地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召开的几次代表大会在总结工作成就时，都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都是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与发展的结合上去总结历史经验，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深刻根源。例如，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述改革开放三十年伟大历史进程时所概括“十个结合”和所强调的“三个永远铭记”，就是我们党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高度统一起来的集中表现，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揭示和科学总结。

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根本问题和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思想理论上的根本要求，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反对任何使主观与客观相割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经验和基本结论，正如邓小平同志概括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而这一“相结合”的根本历史经验和基本结论，其深刻的理论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斗争实践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来指导，因而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又必须在我们党领导的斗争实践中不断地加以丰富和发展，使之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必须在斗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往往突出地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与发展关系的认识与处理上。有些人常常以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居，经常沉

^① 参见1990年6月21日《关于加强党校建设的几个问题》和2001年4月1日《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涵于以往的经验 and 经典文本里，而对于当今世界和现实生活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特点熟视无睹，对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理论不屑一顾；有些人则常常以改革家的面貌出现，他们在谈论改革问题时，要么回避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坚持，要么借口时间和条件的变化去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他们经常谈论的是西方大国的崛起和西方社会制度、社会理念的优越性，鼓吹中国应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述两种思想理论倾向，都是需要警惕和反对的。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和发展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根本的思想理论原则，也是我们党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历史经验。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理论飞跃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应着力研究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伟大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在研究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问题上，可能涉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提出的理论意义的不同领会，涉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理论飞跃这一理论定位的不同理解，涉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相互关系的不同看法等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我在今年第一期《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上撰写的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体会文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定位问题的科学界定与阐发》中，对上述这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都概略地谈及，现在看来，仍感有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必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和相关理论阐发，是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要理论亮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即理论范畴，并对这一科学概念的理论性质、内涵、价值定位等问题作了明确界定和阐发，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党的十七大从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结合上明确地界定和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性质，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理论形态上乃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样就鲜明地回答了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种种质疑、诤难和歪曲。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内涵作了明确界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界定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其理论内容而言，本质上是对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国成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部三个理论成果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相互关系和理论定位问题作出了科学界定和明确阐发，指出这三个理论成果相互间的三个一致性即统一性：它们有一个统一的理论名称，属于同一个思想理论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们一起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理论飞跃。这样,就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形成和创立的三个理论成果的相互关系和理论定位问题统一起来了和理顺了,避免了由此可能引起的某些歧义。党的十七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概念的提出,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几个理论成果的性质、定位和评价问题的新概括、新界定和新阐发,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不仅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需要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作出相应的修改和补充,而且像原来已经确定的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这样的课程名称,也需要作出相应的变动。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应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我国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历史地位的研究和评价中,经常使用“新成果”、“新阶段”和“新飞跃”这样几个相关概念;其实,这几个相关概念在内涵上是有区别的,“新飞跃”当然包含“新成果”,但“新成果”未必就构成“新飞跃”。我国学界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重要理论成果的产生或形成说成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次理论飞跃,其认识的根源就是混淆了“新成果”与“新飞跃”在内涵上的区别。对此,我认为,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地位的研究和评价中,要以“新飞跃”这一概念和思路为视野去展开分析,把“新成果”、“新判断”、“新水平”、“新体系”、“新阶段”这样一些思想上和理论上的评价和分析,纳入“新飞跃”这样一个总体性评价中来。

众所周知,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有两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十三大和十五大,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理论飞跃的论断,而这两次党的代表大会对“两次飞跃”的理论内涵的界定和论述的侧重点亦有所不同。现在看来,关于中央提出的“两次飞跃”的重要论断大有进一步深入领会和研究之必要。这里,就涉及对什么是“飞跃”的理解,涉及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在两次飞跃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定,涉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创立历史地位的评价等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认为,这里所讲的“飞跃”,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新成果”或阶段性的理论成果,而是指对某一较长历史时期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道路的系统的科学认识和总体性把握,是对这一理论创新性和成熟程度的肯定性评价和界定。我们党提出的“两次理论飞跃”的论断,是就两个历史时期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的历史地位而言的。第一次历史性理论飞跃,发生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实践,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而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历史性理论飞跃,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其实践探索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其创新性理论的形成或创立则始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毛泽东同志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就其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和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国情和规律而言,当不属于第一次历史性理论飞跃的范畴,而应归入第二次理论飞跃的实践探索范

畴之中。毛泽东虽然未能实现第二次理论飞跃,但他却为第二次理论飞跃的形成和创立提供了有利条件,并在思想理论上作了多方面准备。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所形成和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要给予充分肯定,要作出进一步理论阐发。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其理论的本质内容而言,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就其理论的成熟程度即科学性和完整性而言,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理论飞跃,它系统地 and 科学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就其实践效果而言,它是被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持续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科学理论体系。我们看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包含着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并提出了许多新思想和新论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确立,标志着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已达到了新的水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理论飞跃;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了实践证明。

当然,还应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实践永无止境,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创新亦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就其总体而言,已从多方面探索和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这样一些有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但是,这样的探索和回答仍然是初步的,有许多深层次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加以深入探索、研究和解决。比如,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关于如何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问题,关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等问题,就需要继续下大工夫加以深入探索和认真研究。上述情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确立,虽已初步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理论飞跃,但这一飞跃的历史进程并未终结,由三十年前开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理论飞跃的历史进程,今天仍在继续。

(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必须深入研究和回答它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关系,科学阐明两者间的联系与区别、继承与发展。这是一个在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后当前我国理论界普遍关注并展开热烈讨论的理论热点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和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建设规律,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须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党的几代领导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长期的艰苦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国情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进行了不懈探索，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从而为我们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系统形成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宝贵经验，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我看来，毛泽东同志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所作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并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些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二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三是毛泽东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过程中提出的诸如关于坚持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勤俭建国、统筹兼顾、政治协商、“双百”方针和理论创新等许多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显然，这些理论成果的提出不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准备，而且其中的某些内容，特别是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理论，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本质内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理论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回答和解决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而贯穿于这两大理论成果中的哲学理论却是一个，即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说，两大理论成果属于同一个哲学体系。我们应该从两大理论成果同属于一个哲学体系的角度，去研究两大理论成果间的关系，去分析和揭示两大理论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这里，还应指出，关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联系或关系问题，在我们党的相关历史文件中和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的论述中已有明确阐发。例如，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对毛泽东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取得的理论成果，作了认真总结，将其概括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并确定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认为在毛泽东的许多“著作中包含的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指出，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过去搞革命靠实事求是，现在搞建设和改革也要靠实事求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关于毛泽东同志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问题，薄一波同志曾提出过一个著名论点，叫做“始于毛，成于邓”。薄一波同志提出的这一论点，言简意赅，用简明通俗的语言高度概括和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理论关系或联系，因而被我国理论界所普遍接受。总之，我们在研究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问题时，要坚持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在联系中讲发展，又在发展中讲联系。一方面，要着力研究和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确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